

尹建章
萧月贤 著

先秦儒家典

现代社会



尹建章 蕭月賢 著

先秦儒家與現代社會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先秦儒家与现代社会

尹建章 肖月贤著

责任编辑：张长发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禹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57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0 册

ISBN7-5348-0713-1/B·18 定价：6.00 元

先秦儒家与现代社会

目 录

前 言	(1)
儒家学说的产生与发展	(12)
儒学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	(36)
孔子的创新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	(51)
孔子的理想社会与借鉴意义	(66)
孔子的治国之道及其意义	(75)
中庸之道的实质与价值	(92)
孔孟的忠孝思想及其产生与意义	(103)
孔孟的民本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	(112)
孔孟的民主精神与人道主义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125)
先秦儒家的道德价值观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	(135)
先秦儒家的外交军事思想及其价值	(147)
先秦儒家的仁民爱物与当代的生态平衡	(167)
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178)
孟子的治国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199)
孟子的劳心劳力说及其价值	(218)
孟荀的工商业思想与现代工商业	(230)
荀子的哲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246)
荀子的治国之道及对后世的影响	(266)
《论语》的文学价值	(281)
孟子散文的艺术与价值	(299)

前 言

我们研究“先秦儒家与现代社会”这一课题，是因为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它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了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支柱，对我国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有着宽宏的包容性和普遍性，为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所重视，孔子已被列入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和“四哲”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思想在世界上的显著地位。我国古代能有这样的思想和世界上尊敬的伟人，难道还不值得我们重视和自豪吗？重视他，就要研究他，而研究的目的，除了要弄清一些是非问题外，主要在于为当今社会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先秦儒家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进而寻绎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尔后再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当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用财富。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事实正是如此。我们若把记写孔、孟、荀言行的《论语》、《孟子》和《荀子》认真加以研读，即可发现他们的某些主张和思想，除了具有明显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级和时代特点之外，就其精神来说，有不少地方和我们的思想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如先秦儒家的与民同乐、实事求是、民为邦

本、强调思想教育、重视精神道德价值等思想，和我们的观点都有相通之处。就军事思想来说，象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和战争胜负取决于民心向背等思想，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人民战争和某些战术思想的形成，都有所影响。

《左传》一书是依据孔子的《春秋》写成的一部历史著作，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先秦儒家的思想观点，毛泽东同志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述，明显地吸收了该书中的精华。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引用了《左传·庄公十年》所记“曹刿论战”一段原文后说：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

他在《论持久战》中还说：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而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

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发展而来的，我们今

天的新思想自然也是从古代文化思想发展而来的，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被我们吸取并加以改造发展，自会成为于我们有用的新东西。

先秦儒家的某些治国理论与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有积极作用，就是对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也不无借鉴意义。美国一九八二年举行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三十三周年的纪念会里根在致词中说：“孔子的高贵行谊和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的原则。”还有人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推断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儒家文化圈的时代。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召开的全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会议上，有人宣称：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四十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近几年来，美国一些著名学者主张，应把儒家思想加以改造，来解决他们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伦理道德危机等社会重大问题。新加坡本世纪的战略目标，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制定的。国际上对先秦儒家思想尚且如此重视和推崇，作为该思想诞生地的中国，更应该成为盛开其研究之花，和盛结其继承发展之果的肥沃园地了。

我们之所以要把先秦儒家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因为当前学界和政界，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对孔、孟、荀及其思想实质，欠正确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如孔、孟、荀各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他们的思想到底是进步的，还是保守落后的？他们的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当今现代化建设，是起促进的作用，还是阻碍的作用？对他们的思想是给以全盘否定，还是予以批判继承等诸多问题，尽管已经经过长期讨论，但至今仍存在较大分歧，因而还需要进一步进

行分析和论辩。同时在研究方法上,有些问题,也还需要考虑。如究竟如何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而不是用割断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研究,如何从本质上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从表面上或片面地看问题,如何从先秦儒家本来的思想面目,而不是从后来被各朝代统治者歪曲了的思想面目去看待它,究竟是学习他们的精神,还是学习所保留下来的他们的文物,等等。尽管这些问题是复杂的,不是一下子都能解决的,但是,只要我们依据的材料是真实可靠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的,观点方法是唯物辩证的,研究是深入细致的,就能给以比较恰当的评价,得出科学的结论;就能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我们知道,任何思想,都是一定时代一定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复杂的,都有其本质特点。先秦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所以,必须把他们及其思想分别放在奴隶制社会已经崩溃,封建社会业已产生的各自的特定时代来评判。如对孔子的“礼”与“孝”和孟子的“劳心劳力”说等的评价,不少研究者都未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都未从其精神实质上给以恰当的评价。再如,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我国解放四十多年来经济没有迅速搞上去,都是由于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和片面的。至于过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从多方面去考察,去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除了我国经济基础薄弱、人口过多、国际环境及旧思想影响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推行了“左”的路线。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除了国际原因外,主要原因在其内部,在他们自己,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象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历来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可是,他们的经济发展并不缓慢,究其原因,固然有外部条件,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内部。我们这样说,并不

意味着儒家思想是他们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只是说明儒家思想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没有起阻碍作用，而起的是促进作用；也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经济建设应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只是说明儒家的某些思想精神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不在儒家思想的流传，因为我们是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儒家思想多有批判，所以，儒家思想对我们影响不大。

先秦儒家都是了不起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学说内容是极为宏博而丰富的，他们的学识是博大精深的。作为研究者来说，在思想，学识上理应高于他们，否则，就深入不到其思想深层次中，就体会不到他们的复杂心情，就悟不出其言语所包涵的真谛。研究者的大忌是为了赶时髦，不深入到其领域内去探索。一旦拘限于为一时的需要的框架中，就会陷于片面性，做不到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就认识不到过去和现在的连续性。由于儒家思想是极为复杂的，若仅仅抓住“仁”“义”“礼”几个概念去探求，那是很不全面的。他们的思想除了政治性方面的内容外，还有日常生活和宇宙自然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说，他们的思想不仅深入到执政者的政治思想及生活中，还深入到文化艺术等领域之中，也深透到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生活之中，它已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态，而成了一种流动着的精神方向。所以，研究者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精神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具体事物来看待。我们研究儒家的思想，不是研究博物馆所保存的有关儒家的文物典籍和其遗留下来的古迹，要研究它的精神。人们常以我们是文明古国，有伟大的长城，有不少文物古迹等等而自豪，若只停留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那些遗物只能证明古人的伟大，而不能说明我们有什么作为。我们不能只歌颂已成功了的英雄，而要歌颂他们为了成功而艰苦奋斗的历程，即学习他们奋斗的事迹与

精神,这才是有意义的,即是对于没有成功而却在希图达到成功之途中奋进不息的人,也要学习其事迹与精神。我们认为,研究者采取这样的态度才是正确而有意义的。先秦儒家尽管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们的某些主张和精神是可贵的,我们应该重视它学习它。在这方面,他们给今人开了个好头。他们对殷周以来的文化思想,并非一味地继承、恢复与保留,而是在对中华民族所创建出来的文化思想,做了大量的整理总结工作之后,肯定并继承了其中有价值的思想与文明精神,并使之延续流传。孔子说的“吾从周”就是这样做的。孟子对孔子的思想就有新的发展,荀子更是吸取了孔孟及其他学派的优秀思想,而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由此启发,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学习其精神,并注入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精神,才能使之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他国家学习马列主义,也必须如是做。只有这样,马列主义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要真正达到吸取先秦儒家思想的精华作为当今社会服务的目的,还必须弄清楚先秦儒家文化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久传至今而不息,而与其同时代出现的墨家、道家和法家等文化思想却不能占据主导地位 and 广为流传的原因。对此,学界有着种种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先秦儒家的文化思想重视维持现实生活,而没有超现实的理想和对神境的追求;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先秦儒家的思想有着严重的保守性;还有人认为先秦儒家思想重视多子多孙,世代相传;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农业为主和语言的统一,等等。以上认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都不是先秦儒家文化思想久传不息的根本原因。当代港、台地区的一些学者认为,先秦儒家文化思想之所以久传不息“是因中

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此使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于长久而不坠”,即“有求久之思想”。这种认识尽管比前几种认识较为切合实际,但也有欠缺之处。我们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有久传不息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它有极为宽宏的涵盖性和世人俱有的共性以及凝聚人们思想的魅力。具体地说,它既有“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又有超越现实的“大同世界”的远大理想;它既有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也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一面;它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又有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它既承认个人私欲之不可避免,又强调社会群体利益,并使二者协调统一起来;它虽然特别强调个人思想道德的修养,又力主推己及人与物;它虽然维护人际等差的制度,又要求人们应和睦相爱。除此之外,他们的中正之道,贤能政治、先富后教、仁民爱物、伦理道德等主张与思想,都含有世人认可的法则。正由于此,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才能从中吸取各自所需要的东西,这是它久传不息的主要原因。而墨、道、法等学派的思想,虽然各有可取之处,但都不如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内容那样丰富,那样具有普遍性;他们更没有儒家能够为其施政方法提供道德上的理由和依据,所以,他们的思想都不能成为传统思想的主流。

为了更好地吸取先秦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对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观点必须加以批判。几年前,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社会上个别所谓的文化名人和学者,提出了只有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实行全盘西化,中国的经济才能迅速搞上去的谬论。他们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仅阻碍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阻碍着今天的四化建设,因此,对儒家的文化思想应全盘否定,等等。我们且不说这些人的用心和政治目的如何,仅就其观点而论,也是极为荒谬的、站不住脚

的。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古代思想文化,都不能全盘否定,都应批判地吸取。只有吸取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化思想,才能创出新东西来。没有吸取就不会有发展,只批判、否定而不吸收,永远创不出新的来。当然,不加分析与批判地吸收,同样也创不出新的。若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或肯定,在这两个方面做得越激烈越彻底,越创不出新的来。这既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又是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五四”时期,我国部分知识分子名流高举批判大旗,对传统文化思想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批判,他们针对当时我国社会的弊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主张科学和民主,鼓励青年知识分子要面向未来,应有开拓进取的无畏精神。这种批判旧文化旧思想,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做法,在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是完全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参加“五四”运动的大部分文人学者,尚未掌握马列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在对封建文化思想批判时,出现了极大的片面性,如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加分析地全盘予以否定,而对于西方文化则全盘予以肯定,殊不知儒家文化思想和西方文化思想都有糟粕与精华,所以,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正由于此,“五四”以后,儒家文化思想并未被彻底铲除,仍然存在和流传。因为任何优秀的文化思想都是批不倒消灭不了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积极部分当然也是批不倒消灭不了的。再如“文革”期间,对封、资、修可谓批判得最激烈最彻底了吧,结果出现了什么新思想呢?所出现的思想不仅不新,比旧的还糟糕、更成问题。那些杂七杂八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大大阻碍了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正常发展,其消极作用直到现在也未彻底消除肃清。其问题就在于把不应该批判的东西也给批判、否定

了。对于应该批判的，也没有抓住其实质而予以批判扬弃。这样做的结果，该否定的没有否定，该吸取的也未吸取。殊不知，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中既有糟粕，也有我们所需要的精华，那种对待古代思想文化采取极左的全盘否定的做法，历来不被马列主义者所赞同。当时，口号喊得最响亮、表现最激进的人物，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不懂马列主义，他们往往是些不真正了解封建思想的内容与实质到底是什么的人。可以这样说，“文革”中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时期，那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除了别有用心的人，大都是对于体现儒家文化思想的“五经四书”可能并未读过，即使读了，也是没有真正读懂的，那么，他们怎能会理解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全部内容和实质呢？所以，他们喊的口号，提出的观点，看起来很新，很时髦，其实是很陈旧的。这些事实教训，应该使我们聪明起来，再不能做那样的蠢事了。

我们早有写这本书的构想，但并非为赶时髦，而是多年来对先秦儒家著作的学习研究和对现代社会的观察了解，发现了先秦儒家的文化、思想、政治、道德和文学艺术等都有其历史的现实的价值，其中思想道德的现实性与前瞻性更为明显，更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我们才把先秦儒家和现代社会联系起来谈问题，力求做到有益于今人今世。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我们看不到世界各国有关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更多材料，因而，对现代社会情况了解得不够，尤其是对更深层次的东西难以晓知，这样一来，自然把握不准社会潮流的动向，所谈问题难免有不当之处。但我们出于对社会人生的责任心，不顾学识浅薄，在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我们的体会与看法写出来，供世人评说。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我们说的儒家只限于先秦的孔丘、孟轲和荀况等人，秦朝以后的儒家和被歪曲了的儒家思想不在我们的论

述范围之内。我们所谈先秦儒家和现代社会联系的问题，是先把儒家思想加以分析、批判和改造之后，才说明它在今天的价值和作用。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古代任何进步的思想，即是绝好的东西，也都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都不能一成不变地拿来为我所用，只有加以改造，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日本人做得是最成功的。他们改造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使之适合于他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将佛教学说也加以改造，以满足于人们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他们的神道学说。他们把这三种学说，很好地构制在一起，协调统一起来，成了他们有用的东西。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他们又从实践中认识到封闭政策的危害性，立即着手研究西方国家经济发达的原因及其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大胆地将它改造为适合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成了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强国。而作为他们老师的我们中国却落在它的后边了。不独日本，象南朝鲜和新加坡等国家，也都是对外国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加以改造，成了有用的东西，以之建设自己的社会。这都说明了对于过去的东西只有加以改造，才能为我所用。所以，我们研究先秦儒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研究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我们认为只有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去研究古代的思想文化，才能使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成其连续性，才能使古代思想文化不断发挥其作用，才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也只有这样做，才是最有意义的。

这本书中吸取了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时，也批评了我们认为是错误的看法。搞社会科学的人，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前人所取得的成绩的恰如其分的总结与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作为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而学

识浅薄的我们,对于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未曾深入探索过,而我们这本书又涉及到文学以外的学科内容,因而,也只能做些他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工作和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与看法,只要这一总结工作和看法能给今人今世一点益处,也就可自慰了。这就是我们的本心。

作 者

一九九一年十月

于郑大西十二楼

儒家学说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社会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不同流派的学说相继产生而成体系。在诸学说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当时和后来最负盛名。孔子等人之所以能创出这一伟大学说，决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社会、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多种原因。

从历史方面看，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给我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奴隶一无所有，被奴隶主视为会说话的工具，任其买卖和杀害，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他们为了争得起码的生活条件和人身自由，采取了逃亡、怠工和破坏劳动工具等手段，向奴隶主展开了斗争，推动了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到了殷代后期，居住在今陕西北部的周族，经过几次迁居，由游牧生活逐步转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于是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当时周文王和其子武王都是较有眼光的奴隶主头领。他们从事实中认识到给奴隶一点自由，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本氏族的强盛大有好处，于是就采取了一些比较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措施，如准许奴隶开垦少量的荒地耕种，给奴隶一定的份地等。这样一来，奴隶的生产积极性高涨了，周部族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周文王甚得同族人民的拥护，奴隶们主动为他修台建池。《诗经·大雅·灵台》说：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鹄鹄。王在灵